

以往的史学研究，整个别人物外关注最多的是他们的史学成就

想和史学成就，就是只注意他们工作的结果，很少关注他们与学

术活动有关的整个人生。其实，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的

BIANGE SHIDAI DE XUWEN RENSHENG 变革时代的学文人生 老师的

变革时代

对话当代历史



邹兆辰 著

的学文人生

文体明星少关注他们每一

人都有一部个人成长的生活史和学术史，研究他都有他的生与学术

发展的历程，对于认识当代中国的史学思潮与趋势是有益的。在

我们共和国的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出现过种种的曲折，但正是有

这样的一批兢兢业业的学者们，才撑起了这一座坚实的史学大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BIANGE SHIDAI DE XUEWEN RENSHENG

变革时代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邹兆辰著

的学问人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邹兆辰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656-0300-6

I. ①变… II. ①邹… III. ①史学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3181 号

BIANGE SHIDAI DE XUEWEN RENSHENG

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邹兆辰 著

责任编辑:丁晓山 责任设计:郑 珺
责任校对:李佳艺 责任印制:何景贤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85千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邹老师辛勤工作十余年的这份成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首先应该表示祝贺！

早在 20 世纪末年，邹老师与江湄、邓京力两位年轻教师一起进行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课题的研究，他们不仅从书籍、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关于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思潮的梳理，并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时他们还走访了很多活跃于当时中国史坛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和中年学者，也包括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在同史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的交流中思考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捕捉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新潮，预测新世纪史学发展的未来。他们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他们所合著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一书，这本书于 2001 年出版，并获得了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它对于了解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进行学者访谈的过程中邹老师发现，直接与当代史学工作者对话，是一个研究当代史学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者访谈，不仅可以了解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且可以结合个案更好地看到这种趋势如何在学者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就需要探讨每位学者个人成长的学术背景，包括师承关系、治学取向、研究路径、学术成就以及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切感受。通过这些访谈，不仅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可以看到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术追求与精神境界。于是，邹老师在课题结束以后，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他所做的工作，有的是反映受访学者对于当前史学发展中的备受关切的问题所进行的建设性的思考，多数是对于受访者个人一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的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的访谈，不仅反映了他们治学的历程，更反映了他们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因此，他把他的第一本访谈录定名为《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相信这些

内容对于年轻一代的学人或者是准备进入史学园地的大学生也是深有启迪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邹老师所访谈的学者有些正是今天在史学各个领域中年富力强的领军人物，他们进入史坛正逢其时，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保证下，他们适时地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成为推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骨干力量，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史学的希望。他们的奋斗历程也可以成为激励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奋勇跟进的精神力量。因此，邹老师把他的第二本访谈录定名为《为了史学的繁荣》。

从史学的整体角度讲，这本书所反映的学者面仅仅是邹老师所能够接触到的史学家的情况，对于整个史学领域来说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史学领域中那些学术大家或史坛新秀的情况进行全面地反映，但是这不能降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为中国的史学发展进行艰苦努力的一代学人所做的开创性的劳动成果，也记录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新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所做的新的开创性贡献。60 年来，两代学人的携手努力，共同开创和发展了新中国史学，记录下这些学人的艰苦奋斗历程，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使命。邹老师正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代学人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所做的贡献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有些访谈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年访问的一些学者今天已经成为耄耋老人，有的甚至已经作古，长期以来除了史学圈内的人士之外，他们并不为社会一般公众所了解。因此，这部访谈也可以说为普通的史学工作者树碑立传，我们不能不说这项工作对于读者了解 60 年来在中国史坛上奋力拼搏的学人们的人生追求和学术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用口述史的方法反映 60 年来中国史学的学术发展，也是一种新的方法，也是国际上流行的方法。西方很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口述史学，特别是在社会史和下层民众的研究中取得很多成果。口述史学的形式与传统的以文献为主的史学研究方式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使历史更富有人文关怀的特点和生动形象的内容。当然，这部学者访谈与一般的口述史也有很大的区别。被访的人物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具有很深学术造诣

的学者，访谈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甚至要参考他们已发表的学术论著来充实对话的内容。但是，由于借鉴了口述史学的形式，就使这部访谈具有了叙事性和人文性的特点，这样就可以使读者与他们可能感到很陌生的历史学家的距离大大缩短。历史学家一贯的职责是研究历史、研究他人，而今天历史学家自己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的确，历史学家要了解人、研究人，同时我们也期望广大读者了解以历史研究为终身追求的那些史学工作者。我想，这种专业人士与广大读者的互动，对于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

刘新成

2009年12月

目 录

序	(1)
我的人生与治学之路——访何兹全教授	(1)
试辟撷英园地，植出盈门桃李——访戚国淦教授	(27)
在哲学与史学之间——访何兆武研究员	(49)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访漆侠教授	(67)
辛亥革命与我的学术生涯——访胡绳武教授	(84)
持续五十年的上下求索——访谢承仁教授	(105)
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访田昌五教授	(129)
为推进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尽心竭力——访齐世荣教授	(141)
读书一生，治学一生——访宁可教授	(170)
在中外历史文化长河中徜徉——访刘家和教授	(197)
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地位——访龚书铎教授	(219)
一位身兼要职的历史学家——访金冲及研究员	(230)
我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访林甘泉研究员	(248)
为有文章惊海外，犹搔华发著新篇——访马克垚教授	(266)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访李学勤教授	(293)

MU
LU

以外庐师的治学精神研撰中国思想史——访步近智研究员	(311)
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访张静如教授	(330)
史学要继承，也要超越——访张磊研究员	(341)
了解当代西方史学趋势，坚持走自己的路——访陈启能研究员 ...	(350)
为继承与阐扬恩师的史学遗产而尽心竭力——访王敦书教授	(361)
后记	(379)



何兹全，1911年9月生，山东菏泽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5年毕业。毕业后曾留学日本，一年后因病回北京，在《教育短波》社工作。抗战期间南迁，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曾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1944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1950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主要著作有：《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至唐中叶）、《读史集》、《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中国古代社会》、《三国史》、《中国文化六讲》、《资治通鉴读本》、《爱国一书生——八十五岁自述》、《何兹全文集》（六卷本）等。

我的人生与治学之路

——访何兹全教授

学者印象：

见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也许不是难事，但是见到一位如何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九十多岁老人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了。他不仅年寿高，而且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也长。1933年，作为一个北京大学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他就开始发表学术文章了，至今已经有75年了。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择善而固执之”，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且不断地把它推向深入。他走过的治学道路，就是一部现代中国史学史。

在上世纪30年代，也就是他读书期间，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研究的重点，是汉魏到隋唐时期的社会史。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就提出了魏晋之际封建说的观点。确切地说，他是用汉魏之际封建说的提法。50年代，他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与阐释；到1979年以后，他的学术见解又进一步得到发展。90年代，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2006年，他的全部学术成果在六卷本的《何兹全文集》中得到了体现。

何先生虽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却不是固执己见的人。他最服膺马克思的辩证法，相信事物总是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发展着，自己也要按辩证法的要求不断前进。他信奉荀子的话，“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就是不顽固、不保守、与时俱进，总以高屋建瓴的态势来观察事物，既观察现实，也观察历史。他用“不用扬鞭自奋蹄”来概述自己一生对学问的追求。这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950年，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刚刚升起的时候，他就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也放弃了去台湾的选择，决心为新中国的史学贡献自己的

才智。“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就是他的理想和抱负。“爱国一书生”，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最好的概括。

最后，何先生对社会问题的坦诚直言，对后学之人的热情诚恳，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问：何先生您好！2001年，也就是何先生九十大寿那一年我和首都师大的同志曾经访问过您一次，那时就为您身体之健康、思维之敏捷感到十分敬佩。几年来，您又有许多成果问世，特别是六卷本的《何兹全文集》的出版，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了解您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都是非常有益的。今天，为了编写《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我来再次访问您，想就您所走过的治学道路做一个回顾，因为您七十年来走过的治学道路是今天青年学子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何：好，欢迎你来，我们谈一谈。你的书叫《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这个题目很好。我说过：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如果客观、公正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五个字可用：“贫乏”、“不浅薄”。当然，这里要说的事情很多，时间太长，七十多年了，不能都讲。我的书你可能看过了，所以没有讲到的地方你可以参考这些书来了解。

一、三十年代初的北大生活

问：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读过您的《爱国一书生》，那是对您一生治学道路的回顾，也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您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的。那个时代就读北大的学者健在的恐怕已经不多了，对那个时代的北大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您可以给我们说说吗？

何：我是1931年暑假考入北大史学系的。当时叫做史学系，不叫历史系。这一年北大招收八十名本科新生，因为有二百名预科生升入本科，所以招的少些。我是旧制初中毕业自学一年考入北大的，有点鲤鱼跳龙门的味道，很是得意。

问：您说的“旧制”是怎么回事？

何：那是1930年的一次学制的变革。在此前，中学是四年制，上大学要读预科。这次改变学制，取消预科，中学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所以要读大学，就要读三年高中。我在山东菏泽的省立六中读了三年初中，并且自修了四年级的课程，就不愿意再从高一读起。1930年到北京，在辅仁大学附中的高二插班，就住在原辅仁大学大楼对面的学生宿舍里。辅仁高中读了一年就读不下去了。因为考学时我用的是旧制中学四年制的临时毕业证明。这是我们假填的，我们只读了三年。学校催我们交正式毕业证书，我没有，只好转学到私立学校。我插到文治中学高三班，学校就在现在平安里西边报子胡同附近。高三插班生招了几百人，也没法上课，半年后考试，我就取得了高中毕业文凭。文治高中毕业，我报考了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结果北大和山东大学录取了，我就上了北大。

我考上北大当然很高兴，也确实很幸运。我是我们何家继何思源大哥以后第二个考上北大的。我到北京不久，就和他联系上了。他当时是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我以后的读书就全依靠他供给了。何思源大哥还为我写信给傅斯年先生，请他作我的保证人。我到北京以后就去看傅先生，他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我，嘱咐我在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

问：那个时候北大的老师都有哪几位呢？

何：那时课堂教学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几位教授。他们的讲课都是很生动的，分析问题非常清楚、深刻，引人入胜，并且处处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使你佩服。那些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斯年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一篇。我们都佩服他的惊人的记忆力。

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的学术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这派可以钱穆教授为代表，孟森、蒙文通教授可以划在这一派里；另一个是乾嘉十西方新史学学派，这派可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另一个是乾嘉十辩证唯物论，这派代表人物可以举陶希圣。当然，我说陶希圣有点辩证唯物论是从学术观点上说的，不是从

政治组织上说的。他在政治上是国民党，或者说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过他们的影响。他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而学术上他所以高出别人的地方，也确实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北大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他开“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个课程，在课堂里他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引了不少人听他的课。我走上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路，不能说不受了他的影响。

我那时的前后班同学，现在在海内外有成就的人不少。在我前边的有劳榦、胡厚宣；我同班的有杨向奎、高去寻、全汉升、李树桐；我下面一班的有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王毓铨；再下一年的有杨志玖、孙思白、任继愈等。这些人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大约都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派，只有我主要是属于陶希圣一派和半个胡适、傅斯年一派。

问：您那时候为什么会陶希圣的学术思想感兴趣呢？

何：那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对思想界、出版界却留下很大的影响。上海出现了很多书店、出版社，出版新兴社会科学的书和文艺书，像雨后春笋一样的新书、新书店，兴盛得很。当时思想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又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大家说，中国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要进行革命就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要认识中国当前的社会，又要认识中国过去的社会。这种气氛在当时的思想界是很浓厚的。

我接触到这气氛的边缘。我说边缘，是因为我对当时思想界问题的本质是非常模糊的，是很不理解的，只是大家说什么，我也跟着说什么。但从影响上说，对我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我入史学系，就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作出的选择。

但我的史学思想和路数和陶希圣并不完全一致。我自己认为，在我读过的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国农民战争》，其次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这些书使我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当时的整个时代、社会出发，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

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会真正认识任何历史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使用的材料，是19世纪学者们研究的成果，可能有的已显得陈旧，今天有了新的提法。但从书的整体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典范，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了透彻的分析和说明。今天我在大学教书，历史系同学问我学习历史要读哪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仍是首先推荐这部书。恩格斯为了说明15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一章里，就先讲了15世纪德国的社会各阶级的发展、对抗形势。考茨基为了说明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教会的发展，也首先讲述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和思潮。这对我们分析历史问题、解释历史问题都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问：您在北大读书期间就已经开始阅读古籍并且开始了写作，这是和今天的大学生不同的。

何：我在大约二年级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那时的图书馆在松公府的平房大院，第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阅览室，屋里南北放着几张长桌，在这里看书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人可以占半个桌子。借的书多了，三面围起书墙，自己藏在书堆里看书，像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从三年级开始写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北京《华北日报》1933年11月22日和12月6日《史学周刊》上。当时为什么要搞宋史，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大概是对北宋的役法和王安石变法感兴趣，就读起宋史来。但当时写文章，主要用的是《文献通考》的材料。

我的兴趣不久就转移到汉魏晋南北朝。我写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是我在大学三年级下，即1934年上半年写的，刊登在1934年9月《中国经济》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中国经济史专号》上。一个大学生的投稿，居然能够发表，当时自然是很高兴的。特别使我兴奋的是，一天我去看汤用彤老师，问他佛教史上的问题。汤老师问我：“你是何兹全吧？”我当时就想，汤老一定是从这篇文章知道我的。谈话中，汤老给了我很多鼓励。一位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对一个后生小子如此厚望，使我一生难忘。陶希圣也在下一期《中国经济史专号下》里写文章，

称赞我写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随后他办《食货》就约我写稿。我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篇《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因此，1934年12月出版的《食货》创刊号里就有了我的文章。

从1933年11月开始发表文章，到1935年北大毕业，在这两年里我总共发表了7篇论文。最后一篇《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完稿于1935年上半年，是我北大毕业的论文。陶希圣是我的指导教师，他给了我88分。那时我还是北大三、四年级的学生，由于年轻，只有20多岁，所以胆子大，掌握材料不多，有一知半解就敢写文章，当然也不是没有新见解。30年代中期，史学界出了不少人。除了我上面说的北大的一些人以外，季羨林、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史念海等都是30年代中期毕业。平心客观来说，我只是30年代这一群人中一个附时代骥尾的笨人。但是，傻人多福，又经“文化大革命”不死，侥幸活了下来。

问：那个时代在北大读书，除了上课、读书、写文章以外，还有什么生活内容呢？

何：那时候除了上课、去图书馆以外，最常走动的是去书摊。当时东安市场、琉璃厂、隆福寺等地，都有很多旧书铺。书商中也有不少懂版本的内行人。我最常去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摊街，叫丹桂商场，这里离北大最近。吃过晚饭，就到这些书铺看看。遇到新书就翻着看，遇到自己需要的书，就买上一两本。那时也有盗版书，错字比较多，但是便宜。穷学生也不讲究版本，只要便宜，错字多点也无妨。

当时北京的庙会比较多。厂甸的庙会是每年正月，从和平门到琉璃厂顺街搭起大棚，街心是书摊，两旁也是书摊。另外的大庙会有东岳庙、白云观等庙会。护国寺、隆福寺也有庙会，规模小一些。这些庙有庙会的时候，我也去逛。

那时去海淀、颐和园、西山没有汽车，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去。自己没有车，就租车去。租车很方便，骑一天回来交3角钱也就行了。

我在北京最喜欢看戏。我刚到北京就和同学去过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看荀慧生演的《元宵谜》。在北大这四年里，名角的戏像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言菊朋等，我都看过。但我最喜欢看的是杨小楼的戏，他的拿手戏《落马湖》、《恶虎村》、《长坂坡》等，我都看过。此外，还常看富连成科班的戏，后来一批很有名的演员，当时还

都是娃娃。

掐指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中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我童年也是比较幸福的，但童年是在天真无知中生活的。北大四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比起童年，是高层次的幸福。

二、我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问：您从北大毕业是1935年，到北师大工作是在建国后的1950年，这中间的十五年正是战争的年代，社会在动乱，您的经历也比较复杂吧？

何：好，我谈谈这段时间的经历。1935年暑假，我北大毕业，去日本读书。陶希圣先生写信给日本铃木俊教授，推荐我进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但是我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在北大的四年，我一天到晚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很少看。到日本后，看到日本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工作非常紧张，回顾国人的死气沉沉，内战不已，心里非常痛苦，觉得此时此地不是我读书的时候和地方。由于思想矛盾、痛苦，导致了神经衰弱。这样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到《教育短波》社工作。这个《教育短波》是一些朋友共同创办的，是以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刊物。社长是朱启贤，是我的朋友。在这里工作比较自由，我也可以养病。抗战前后，《教育短波》社迁到南京，南京失陷前不久又迁到了武汉。这时，陶希圣先生也到了武汉，他在“艺文研究会”任设计总干事，实际上总管研究会的事。艺文研究会下有一个研究组，组长由陶希圣兼，请了几位北大的毕业生参与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任务主要是主编《政论》。《政论》原来由《教育短波》社出版，抗战以后我们想多发表一些政治意见，就创刊了《政论》，由我任主编。艺文研究会成立以后，每月补助《政论》200元印刷费，它也就从《教育短波》中分出来。我在《政论》上发表了几篇阐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文章，观点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后来，艺文研究会迁到重庆。陶希圣去了香港以后，艺文研究会也就停办了，我也失了业。我生

活无法维持，写信给傅斯年先生求助。这时中英庚款董事会正办专款协助学术研究，傅先生推荐了我，这样我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协助，附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系主任金毓黻教授，要我为外系开中国通史。每月能有一点讲课费，这样我的生活就得以维持。这时，陶先生在香港办了个《国际问题通讯》，由我每周把重庆各报的社论和时事评论文章剪了寄给他，同时还写一篇一周时事评述。陶先生每月给我寄300元，这样我在重庆的生活就有保证了。日军占领香港后，陶先生也逃出了香港，寄款自然没有了。我因生活困难，到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多，主要是编写教材，如地方建设、乡镇财政等。

1944年，傅斯年先生到重庆，我去看他。我问他能不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去。这时候，我已经不像抗战初期那样，编刊物、发表政治意见，充满年轻人的政治热情，我想还是回到书斋为好。傅先生说：“你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就到了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这是我一生中一次命运攸关的重大选择。这个决策对了，才有我的今天。史语所远在昆明的李庄，从重庆到李庄是坐船去的，大约三天的路程，白天行船，晚上靠岸住宿。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一个文化区。这里有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有同济大学，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所。李庄的生活很平静、安适，适合读书和休息。我在这里写了一些关于经济史的文章。抗战胜利后，史语所复原到南京。

问：那么您怎么在抗战胜利以后又去美国留学呢？

何：在史语所的时候，我是助理研究员，而和我同班毕业的人，已经是副研究员了，心里不平衡，于是就产生了出国的想法。1947年初，山东省政府派我出国考察，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我把家安排好，就准备出国了。1947年5月到了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在这里，我主要学习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因为我是搞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的，所以我到美国学欧洲史，就是为了和中国史做比较研究，没有改行学欧洲史的思想。况且学欧洲古代史，还要学法文、德文、拉丁文或希腊文，我只会点英文，根本够不上学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条件。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只读书没有读学位，博士论文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外语。傅斯年和陶希圣先生在我出国前，都和我说不必读学位，